

中国海洋大学“985工程”海洋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经费资助

面向历史的 心灵救赎

——郭沫若历史剧研究

王小强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面向历史的 心灵救赎

——郭沫若历史剧研究

王小强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面向历史的心灵救赎: 郭沫若历史剧研究 / 王小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161 - 4668 - 2

I. ①面… II. ①王… III. ①郭沫若(1892 ~ 1978)—历史剧—
文学研究 IV. ①I2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611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闫 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62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海洋大学“985工程”
海洋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经费资助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重点项目资助（项目编号：GY2014A04）

序

“文革”已经过去了40多年，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是否可以再研究呢？这里，问题的提出显然针对的是现代文学大家郭沫若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很明显，郭沫若在“文革”期间所犯种种错误，基本上是没有骨气的。他之前的东西不可能写的一无价值，他惧怕“文革”的威严，害怕毛泽东的威严，在“四人帮”的逼迫下第一个提出要把所有的自己所写的书都烧掉。中国人最痛恨没有骨气的人，所以他在“文革”后遭遇“无耻文人”的辱骂，也就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理性该理性，历史该历史。在“文革”过了四十多年后，以理性的态度重新研究郭沫若的历史剧，把正确还有正确，把错误还给错误，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我觉得王小强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采取了这种科学的态度，是值得称赞的。值得一提的是，王小强又把这种思想推进了一步。他说：“‘反思郭沫若’现象中，是非曲直，于今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这场‘反思’本身，对于郭沫若研究，起到了一定推动的作用，即通过‘反思’完成‘祛魅’，在历史的沉淀中还原一个具有丰富个性的郭沫若。”这些话都说得很好。但我们似乎可以不仅“还原”一个丰富的郭沫若，还可以进一步呈现一个“真实”而又“真实”的郭沫若。因为在历史剧中，郭沫若的思想、性格、个性毫无遗漏地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对于一个作家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看研究者对于作家研究的关键是否有重要的推进。这里要提到几点，首先是研究者对郭沫若早期作品生成的分析。与以往的研究不同，过去研究者只是在20年代的历史语境上重来反去、絮絮叨叨，而较少有真正进入郭沫若艺术世界的。这对极为重视自己“内部”的郭沫若来说，对其作品作者中介的把握显然是不够

的。王小强对郭沫若强调“艺术是内部发生的”作了深入的分析。他以“面向历史的心灵救赎”，“个性解放浪潮中的艺术凝结”等具体分析作出回应，我认为他对此的推进，是论文的贡献之一。

郭沫若历史剧一步一步发展，在情节和人物设计上，层层深入，王小强在这方面做了过细的研究，表现了论文的创作能力。郭沫若的最高成就是他的《屈原》。《屈原》一大艺术特征是象征。王小强认为：“出于历史事实的制约，郭沫若不能改变史剧题材故事的基本走向，即‘善’的力量的毁灭和‘恶’力量的残存。但是，在郭沫若看来，历史不只有情性的一面，在史剧创作中，更主要的是历史的积极一面，即人类在文化的道路上总是能够战胜兽性的畛域，并不断向前迈进。为此，郭沫若认为，史剧题材的处理，不但在精神文化结构上，能够与现实社会形成同构关系，还应当能够对未来有所昭示。这便触及了他对历史题材隐喻性处理的第三个层面：象征意味层。”所以，历史学把事实记录下来，戏剧作家在认识这真实之后，写出更现实的历史剧来，开掘出并发展“历史精神”。王小强对此点的重视和强调，也是很深刻的，可以说把象征问题说透彻了。

本书作者十分注意郭沫若“人民本位”“人民共荣”，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民族自决”的思想。并指出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观点的要义来：“郭沫若的“人民本位”思想不是一个狭隘的文化思想，它是宽泛的，宏阔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王小强又把“人民本位”思想转到艺术批评的真善美标准上来，他的论述是深刻的，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与艺术是相同的，他的见解是有有新意的。

王小强还如此年轻，只要继续努力，一定会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王小强
2014-8-28

目 录

导论	(1)
一 研究契机	(1)
二 郭沫若史剧研究述评	(3)
(一) 史剧研究的文艺社会学批评模式	(3)
(二) 关于史剧的审美批评和研究	(8)
(三) 历史题材处理问题的批评与研究	(10)
三 理论背景及研究途径	(12)
 第一章 个性解放浪潮中“内部”情绪的艺术凝结:20 年代	
史剧创作	(14)
一 孤傲诗人的内在压抑与超越	(15)
(一) 早期生活的“内部”沉淀与人格生成	(15)
(二) “内部”超越性追求与“泛神论”思想体系建构	(27)
(三) “内部”规定模式:早期诗学追求	(34)
二 早期史剧情绪表现的艺术世界	(46)
(一) 史剧的界定	(46)
(二) 史与诗的思考	(47)
(三) 早期史剧中的情绪世界	(49)
(四) 早期史剧的形式探索	(83)
(五) 早期史剧的评价问题	(94)
 第二章 民族救亡中生命激情的历史回响:抗战时期史剧创作	(97)
一 郭沫若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转变及其抗战史剧探索概况	(97)
(一) 郭沫若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转变	(99)

(二)文艺观的发展与变化	(104)
(三)抗战史剧探索概况	(114)
二 抗战史剧题材处理的原则	(118)
(一)题材处理的历史优先性原则	(118)
(二)题材处理的隐喻性原则	(133)
(三)题材处理的情感体验性原则	(142)
三 抗战史剧的人物性格塑造	(153)
(一)史剧人物塑造的方法和原则	(154)
(二)史剧人物类型化	(158)
(三)文化英雄——抗战史剧中的典范形象	(161)
四 抗战史剧的形式追求	(173)
(一)悲剧形式的选择及其文化价值含蕴	(173)
(二)史剧的语言要素及技巧运用	(176)
(三)史剧情节要素的把握及美学追求	(184)
 第三章 新社会文化认同中的翻案颂歌:新中国成立后史剧创作	(192)
一 新中国社会文化认同中的艺术功利追求	(192)
(一)人民本位思想与新中国社会文化的认同	(193)
(二)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	(197)
(三)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危机	(201)
(四)做“人民群众的扬雄”:文艺活动的政治功利性追求	(203)
二 “翻案”与歌颂:新中国成立后史剧的艺术追求	(206)
(一)新中国成立后史剧题材的选择与处理	(206)
(二)新中国成立后史剧人物的创造	(218)
(三)严肃喜剧(悲喜剧):新中国成立后史剧形式的探索与 追求	(227)
 结语	(232)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3)

导 论

一 研究契机

郭沫若的史剧创作，伴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展开，绵延 40 余年。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每一部史剧作品甫一发表，便以突出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意蕴，震撼中国文坛，引起批评界持续且热烈的关注。因此，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对郭沫若史剧的研究，就成为文艺批评界的一个热点，一直到了今天。而当我们把郭沫若的史剧放在中国话剧艺术史的长河中考察时，更会注意到郭沫若史剧探索所表现出的重大的文学史意义：他的史剧探索，对我国起步于 20 世纪初的话剧艺术民族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并成为这一进程的杰出代表。正是由于其作品巨大的艺术魅力、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意蕴及重大的文学史意义，对郭沫若史剧的研究，已成为我国戏剧文学研究中举足轻重的研究对象。本书对郭沫若史剧的研究，正是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进行的。时代的发展，总是能赋予人们新的视野去重新认识既存的现象，本书相信，在 21 世纪重新对郭沫若历史剧进行深入研究，必定会有新的有价值的发现。

以上，是本书对郭沫若史剧研究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此外，直接促动本书研究兴趣的因素还有两个：其一，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反思郭沫若”现象；其二，是近年来历史题材作品的兴起及其所引发的巨大争议。

1. “反思郭沫若”现象。“反思郭沫若”现象，发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与文艺研究中的“后革命”语境有关。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政治狂热的退潮，文艺研究中“后革命”语境渐渐形成。在“后革命”语境中，当过去在政治裹挟下的“革命”视角，受到当代文艺研究家们的质疑时，一场巨大的对“革命”的反思，也就

在所难免了。在“反思”潮中，作为“革命”经典作家的郭沫若，自然成为被“反思”的重要对象之一。由此，便形成了文坛热闹的“反思郭沫若”现象。在“反思郭沫若”现象中，199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反思郭沫若》一书，集中体现出对郭沫若在一种“后革命”语境中的解读。在“反思”中，个别学者对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人格操守进行了质疑^①，许多学者则反反对郭沫若的这种质疑，一时众说纷纭。与“反思”论争同步，在其他一些未参加评论的学者那里，郭沫若从“鲁郭茅，巴老曹”经典作家排名中严重下滑，引起舆论的关注。这样，关于郭沫若的争论和排名，就一起构成了“反思郭沫若”现象。

在“反思郭沫若”现象中，是非曲直，于今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这场“反思”本身，对于郭沫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即通过“反思”完成“祛魅”，在历史的沉淀中还原一个具有丰富个性的郭沫若。在思想和学术更加开放自由的今天，也许只有经过这种“祛魅”，对郭沫若的地位和评价才能够更好地加以重估和把握。目前，郭沫若研究逐渐开始升温，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郭沫若历史剧进行系统研究却还是一个空白，这也就为本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2. 本书对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契机，是近年来我国历史题材作品所引起的论争。关于历史题材如何处理的论争，自古就有，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屡屡成为重要论题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一批对历史、人生、现实极为关注的历史题材作品相继出现，比如凌力的《星星草》《少年天子》等清史系列小说、唐浩明的《曾国藩》等清史小说、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小说、赵玫的唐宫系列小说，等等。这些历史小说，力图以“后革命”语境来对历史做出新的“翻案”，并立足当代文化视野，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隐喻中，对历史进行重塑。不过，这些历史小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创作实绩，但是在历史观、题材处理、现实关注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此外，对

^① 在对郭沫若的质疑中，余英时攻击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余杰《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对郭沫若人格的攻击，魏明伦在《〈巴山鬼话〉自序》中对郭沫若晚年人格的不屑态度，以及一度引起轰动的陈明远书信造假案，等等，都成为这次“反思”引人关注的焦点。前者对郭沫若人格、学品持全部或部分否定态度，与台湾地区学者谢冰莹20世纪80年代《于立忱之死》中攻击郭沫若人格相呼应；后者则属于版权侵犯问题，但对于郭沫若研究材料的真伪造成了影响。

历史题材作品的兴起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引人关注的大批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拍摄。与历史题材小说兴起几乎同步，在商业化、娱乐化的推进浪潮中，一时间，所谓“翻案”“戏说”“新说”“笑谈”等历史影视剧的拍摄大有风起云涌之势。然而，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在极大丰富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也将历史题材创作中的问题放大暴露出来。这样，历史题材的处理问题，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无论是“翻案”也好、“戏说”解构也好，都具有存在的理由。但是，由于历史、现实和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许多作品在历史题材处理方法和原则中产生了混乱、迷茫，甚至是反历史主义的倾向，这是文艺批评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在今天历史题材作品的研究热中，以往成功的历史题材的作家作品、创作理论，对今天的历史题材创作研究，显然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在这种背景下，郭沫若的史剧题材处理所留给我们的可资借鉴的意义，也就成为本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契机。

二 郭沫若史剧研究述评

对郭沫若史剧的研究，可以以他的去世和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反思郭沫若”现象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郭沫若生前，对其历史剧的研究往往与其史剧创作历程保持着同步。郭沫若史剧创作的每一个时期，随着其作品的产生，都会引发广泛的关注和批评，这个过程又可以细分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40 年代、五六十年代三个分阶段。而从新时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郭沫若逝世以后，对郭氏史剧的研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的论文和一些整体性综合研究的专著，宏观研究成为明显特征。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今，随着“后革命”语境的到来，郭沫若史剧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基本上，在每个阶段，对郭沫若史剧的研究都与时代语境紧密相连，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是，在这些不同的研究背后，郭沫若史剧研究又呈现出一些相似的问题关注角度，并形成了以下较为典型的批评模式，产生了如下一些焦点问题。

（一）史剧研究的文艺社会学批评模式

对郭沫若史剧进行文艺社会学评价，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并持续

到现今，是郭沫若史剧研究的主要模式。不过，随着时代不同，创作情况的变化，对郭沫若史剧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呈现出一个富于时代特色的发展变化的进程：

(1) 早期以两性伦理和社会反抗思想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以仁、钱杏邨、顾仲彝、向培良、邓中夏、冯乃超等人^①围绕郭沫若《三个叛逆女性》展开的论争，主要就是以社会学视角展开的。基于艺术功利要求，王以仁、钱杏邨、邓中夏、冯乃超等人分别从时代精神、女性抗争、革命功利等方面，对《三个叛逆女性》予以了肯定。比如，冯乃超认为作品中的热情“是作者对于社会的反抗的翻译”，因而肯定了作品，而顾仲彝、向培良则从要求戏剧非功利要求入手，反对“剧本放在教训的重轭之下”宣教抹杀人物个性。

(2) 抗战时期以民族精神和社会革命为核心的文艺社会学批评时期。20世纪40年代随着《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孔雀胆》《高渐离》《南冠草》等史剧的相继发表，针对这些史剧的文艺社会学批评也相继展开。《棠棣之花》发表以后，舜瑶在《正义的赞诗，壮丽的画图》^②一文中慨叹“人心不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棠棣之花》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李长之的文章《棠棣之花》^③客观冷静，则重点探讨了剧中理想人物，称赞了全剧“伦理空气是那样的完整”。《屈原》《虎符》等剧诞生后，一方面，围绕这些史剧，批评界展开了一场具有鲜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斗争：国民党的张道藩、潘公展等人组织国民党文人对之进行诋毁和诬蔑，共产党方面则借这些史剧进行反独裁政治抗争的阐释；另一方面，在民族文化抗敌的语境中，关于这些史剧的论争，又都注重了文化抗敌的斗争需求，以民族文化精神阐发的方式，诠释作品主题、人物形象性格内涵，等等。围绕《屈原》评论的主要文章有孙伏

① 钱杏邨文《郭沫若及其创作》，王以仁文《沫若的戏剧》，向培良文《所谓历史剧》，见黄人影编《郭沫若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顾仲彝文《今后的历史剧》，见《新月》1928年第1卷第2号，第1—10页。邓中夏文《贡献于新诗人之前》，见《中国青年》1923年12月22日。冯乃超文《艺术与社会生活》，见《文化批评》1928年第1号。

② 章文、欧阳文、舜文原载《新华日报》1941年12月7日第4版《〈棠棣之花〉剧评》专刊。

③ 李长之：《棠棣之花》，《文艺先锋》1942年第1卷第4期，第25—28页。

园、刘遽然、周务耕、金灿然、柳涛等人的评论^①。围绕《虎符》的评论主要有褚遂初、柳涛等人^②。围绕《孔雀胆》的评论主要有翦伯赞、徐飞、陈淳耀、金同如、唐轲等人^③。《南冠草》发表后，曾得黄炎培好评，但当时历史剧影响渐趋消沉，评论较少。这些伴随着史剧的评论文章，往往从时局出发，对每个史剧的主题及人物形象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对史剧悲剧英雄们身上的民族文化精神做出了深入的阐释，对主题的文化内涵做了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发扬。比如，孙伏园认为《屈原》充溢着正气，阐释并弘扬杀身成仁的中国精神；柳涛指出，《虎符》剧作中有“宽厚爱人”的信陵君和争取“把人当成人”而死的如姬两个典型及相关的主题，并将如姬和信陵君形象与屈原形象对照，指出他们是以“德治”统一对抗武力统一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徐飞不同意《孔雀胆》“善与恶—公与私—和与分的斗争”的主题，认为这个史剧的主题应该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终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等等，这些评论在当时都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影响。

(3) 新中国成立后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艺政治学批评。到《蔡文姬》《武则天》两个剧作创作之前，郭沫若的史剧评论经历了一个被庸俗化的社会学批评过程。特别是《虎符》，被许多批评家以“抗美援朝”的现实政治需求加以政治学解析，对这个史剧的理解作了不正确的歪曲。而《屈原》的文艺社会学评论也被紧缩在政治学批评的藩篱中，

① 孙文《读〈屈原〉剧本》，《中央日报》（副刊）1942年2月7日；刘文《评〈屈原〉的剧作和演出》，《中央日报》1942年5月17日；周文《从剧作〈屈原〉想起》，《文艺生活》1942年第2卷第2期，第42—43页；金文《〈屈原〉为什么“成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7月11日；柳文《文艺生活》第3卷第5期，第28—36页，1943年5月15日文献出版社印行；《徐迟先生的来信》载《新华日报》1942年4月3日。

② 褚文《虎符》，原载《文艺先锋》1942年11月第1卷第4期；柳文《〈虎符〉中的典型和主题》，原载《中原》1943年9月创刊号第19页；赵文《谈》见《新华日报》1943年2月6日。

③ 翦文《关于〈孔雀胆〉》，《新华日报》1942年12月31日第4版；徐文《新华日报》1943年1月18日第4版；在持续评论中，文章还有陈淳耀的《〈孔雀胆〉在观众中的影响》，《新华日报》1943年1月9日；金同如《话剧〈孔雀胆〉》，《新华日报》1946年1月27日；唐轲《“孔雀胆”》，天津《大公报》1947年10月31日。

突出剧作的人民性。虽然有陈瘦竹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①和王淑明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②等文艺论评论文,但是整体上社会学视角的批评阐释开拓性不大。1959年《蔡文姬》出版、1960年《武则天》出版又引起了热评。但是,这些评论的社会学视角也都局限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强调之中,很难突破。

(4) 新时期以来文艺社会学批评的回归与缅怀式研究。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我国文艺界呈现出一个文艺社会学批评的回归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批评,主要是伴随对郭沫若逝世的缅怀进行的。因此,从新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郭沫若史剧文艺社会学视角的评价多赞美式总结性评价。这些评价中,虽然有些文章仍然不能脱离政治文艺学的论证思维,但是,也有一些文章能够站在较为开阔的视角上,对郭沫若史剧做出较为深入的分析。比如,高国平在《让明天清早呈现出一片干净的世界》和《翻案何妨敷粉多》^③等文章中,在对《孔雀胆》和《武则天》的评价中,力图绕开政治文艺学的束缚,试图将主题纠纷孕育并统一在艺术创新和美学分析之中,而非过去的政治标准之中。与这种对郭沫若史剧研究的深入相一致,在文艺社会学视野中,还出现了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傅正乾的研究较为突出,通过对郭沫若《武则天》和宋之的的《武则天》的对比研究,他对郭沫若塑造有为、有谋略、宽容的政治家形象的武则天,进行了社会文化原因的对比说明;另外,在对《孔雀胆》和歌德的《哀格蒙特》的比较研究中,他分析了哀格蒙特和段功两个妥协主义的异同,对克蕾西和阿盖悲剧形象进行对比,并从社会文化深层挖掘悲剧内涵,也富于学术意义^④。

在文艺社会学批评视角中,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到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国对郭沫若史剧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其标志是关于郭沫若史剧的研究专著相继出版。这一时期,黄侯兴、田本相与杨景辉、高国

① 陈瘦竹:《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戏剧丛刊》1958年第3辑。

② 王淑明:《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③ 高国平:《让明天清早呈现出一片干净的世界》,《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5期。《翻案何妨敷粉多》,《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

④ 傅正乾:《郭沫若与中外作家比较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平、吴功正、王锦厚、韩立群、傅正乾、张志勋、王大敏、何益明^①等批评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视野内，都相继建构起各自对郭沫若史剧的综合研究体系。这些专著对郭沫若史剧在研究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严格的学术化思路进行整体研究，有的侧重于美学鉴赏式的把握（如高国平《献给现实的蟠桃》后半部是鉴赏式的单部史剧分析）；有的侧重于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研究（如傅正乾的《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有的侧重于史剧作品的艺术分析；有的侧重于横向的问题分析，有的注重历时与共时相结合来研究（如王锦厚等人的《郭沫若史剧论》、王大敏的《郭沫若史剧论》，前半部都是历时性研究，后半部则是共时性问题研究）；等等。这些专著的出现，使郭沫若史剧研究超越了过去单部史剧研究的局限，呈现出整体把握的态势。在这些专著中，尽管各自的研究体例有所不同，分析的侧重点也不同，在理论资源上，后期的一些专著还引进了一些新的话剧理论、美学新思想，但总体来讲研究的理论出发点都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批评体系建构的范畴。这些著作在论述言语风格上，都承继着传统研究的“革命”的言说方式，并在这种言说方式中隐含着对郭沫若的革命缅怀和崇敬；在理论思路，都对郭沫若的作者“中介”作用挖掘不深，并且在问题的研究上往往对不同史剧创作时期的区别重视不够。

（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后革命”语境中的泛文化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革命”语境的消解，郭沫若的史剧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平淡的时期。不过，在这个阶段，西方新思潮的涌进还是为郭沫若史剧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呈现出泛文化研究特征。这些泛文化研究包括女性研究、历史文化含蕴研究、新思潮（如新历史主义）透视，等等，研究展示出多视角透视的

^① 黄侯兴：《郭沫若历史剧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田本相、杨景辉：《郭沫若史剧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高国平：《献给现实的蟠桃》，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吴功正：《沫若史剧论》，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王锦厚等：《郭沫若史剧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韩立群：《郭沫若史剧创作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傅正乾：《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志勋：《沫若史剧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大敏：《郭沫若史剧论》，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何益明：《郭沫若的史剧艺术》，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局面。

在郭沫若史剧社会学模式的研究中，虽然形成了很多有效的社会和文化解读的途径，但是，在具体研究中，以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来直接说明郭沫若史剧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而对作为作家的郭沫若的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中介”作用重视不足的现象，却是普遍的。这样，对于重主观和表现的郭沫若史剧创作来说，这种研究具有某种程度的“短路”特征。当然，也有部分批评文章，注意到了郭沫若个别作品中表现出的创作心理激情，但是，就深度和广度而言，比起对郭沫若早期诗歌研究中对这种个人心理中介的重视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这给本书的研究也就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二）关于史剧的审美批评和研究

总体来讲，过去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批评和研究，形成了以文艺社会学批评为主导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与郭沫若史剧强烈的社会功利追求具有一致性。但是作为富于艺术魅力的作品，郭沫若史剧在文艺社会学研究主导模式中，也生成了符合作品艺术渊源和艺术特性的审美批评传统。

对郭沫若的史剧进行深入的审美分析，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史剧批评中就已经有突出的表现了。二三十年代，章克标的《创造二卷一号创作评》^①和张继纯《卓文君》^②，都是从戏剧理论角度对《三个叛逆女性》进行评价的。他们对《卓文君》第三幕的聚焦点分散为两个提出了批评，对称谓、用典、人物性格与立意关系等方面作了分析。而钱杏邨则在文章中谈到了王尔德《莎乐美》和易卜生《玩偶之家》对《三个叛逆女性》的影响；另外，他还从人物过分刻画、太多叠句、旧戏氛围重等角度作了批评。

抗战时期，批评家们在坚持抗战与革命功利视角的社会学批评的同时，非常注重作品的艺术性研究，对人物性格塑造的优缺点、史剧结构安排的合理性、史剧的诗性特征、史剧语言的准确与合理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批评。比如，舜瑶赞叹《棠棣之花》是“正义的赞诗，壮丽的画图”，刘遽然赞赏《屈原》是一首淳美的史诗，柳涛对《屈原》“悲壮

① 章克标：《创造二卷一号创作评》，《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6月17日。

② 张继纯：《卓文君》，《北平晨报》1931年8月9日副刊第32—33期。

剧”和《虎符》意境高远的风格定位，徐迟对《雷电颂》删改的建议，等等。这些美学的批评和分析，基本上从史剧文本角度，对郭沫若史剧进行了艺术的把握，见解都有独到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受政治文艺学的影响，对郭沫若史剧的审美批评进展不大，其中，由郭沫若史剧引起的关于话剧民族化和话剧是否向古典戏曲学习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深入，但论题本身是有价值的。

新时期对郭沫若史剧的探讨中，在文艺社会学批评的复归中，对郭沫若史剧的艺术性评价得以恢复，关于《屈原》《虎符》《棠棣之花》《蔡文姬》《武则天》等史剧都出现了专门的美学批评的文章。比如，高国平的《让明天清早呈现出一片干净的世界》《翻案何妨敷粉多》，田本相的《〈虎符〉论》，康林的《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彭阜民的《〈棠棣之花〉综论》^①，以及上面提到的傅正乾等人的文章，都突出了史剧的浪漫主义特色和艺术虚构特性，并从艺术性分析着手肯定了郭沫若的史剧。除了针对单部史剧的美学评价文章，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对郭沫若史剧进行整体美学研究的论文。比如，王瑶的《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陈瘦竹的《郭沫若悲剧创作的历史地位》等。王瑶在文章中，将郭沫若史剧的艺术成就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相联系，为郭沫若史剧的艺术美学的探讨确立了正确的思路。在这种思路下，王瑶对郭沫若史剧题材处理的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对此，我们将在下一个问题中专门介绍。陈瘦竹在文章中，则联系世界悲剧的发展趋势和美学内蕴，对郭沫若史剧的悲剧美予以评价，文章立意宏大，研究较为深入。在文章中，陈瘦竹将郭沫若史剧中“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雄壮之美”，在与古希腊戏剧、以及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等世界戏剧悲剧美的对比中加以阐释，指出郭沫若的历史悲剧使悲剧艺术在世界“悲剧衰亡”期再现辉煌，挽救了世界悲剧^②。在这一时期对郭沫若史剧研究的专著中，作者们也都注重从诗剧、人物形象分析、历史题材的开掘、悲剧美、结构、线索、情节与冲突、浪漫主义手法、语言等方面对郭沫若的史剧加以美学分析。在这些专著中，论者们往往重视史剧艺术的历史诗学

① 田文见《戏剧论丛》1982年第2期，康文见《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彭文见《辽宁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② 陈瘦竹：《郭沫若悲剧创作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84年第1期。